



先行一步的探索

——广东经济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的思考



王利文 李金亮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先行一步的探索

——广东经济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的思考

王利文 李金亮 主编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行一步的探索：广东经济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的思考 /
王利文，李金亮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 - 7 - 218 - 05973 - 0

I. 先… II. ①王…②李… III. 经济体制改革—广
东省—文集 IV. F127.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923 号

责任编辑	易 军
封面设计	杨 飞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鹤山市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3. 875
插 页	1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5973 - 0
定 价	32. 8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s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s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37579604 37579695】

献绘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广东经济学会五十周年

阮乃敏 68

代序言

三十年的跋涉 三十年的探索

——广东经济学者在改革开放中的亮点思考

微 明

弹指一挥之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个年头。

百年易过，三十年难忘。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作为一个研究改革开放和服务改革开放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回首这段难忘历史的时候，特别是在回忆他们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所作的理论思考以及在改革开放中起到的作用的时候，到底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呢？

打一个不是十分确切的比方吧。这种感受以及这种评价，就如同是在一场规模巨大和时间漫长的战斗告一段落之后，指战员们在进行阶段性战斗总结时所产生的那种感受以及所进行的评估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指战员们的所有的感受和所有的评价，大都离不开一个尺度或者参照物，那就是跟他们在战场上交手的对手以及这个对手的强悍程度和顽固程度。因此，若要体察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中的感受，若要总结他们在改革开放中的思考和作用，还得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大陆所面对的陈旧经济体制说起。

(一)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陆的经济，从体制的角度来说，它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效法“斯大林模式”建立起来的、并在其后几十年的演变中被推到了一种极端地步的经济。

这种经济的体制内容和体制特征，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略的公式去加以概括和描述：

$$\text{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经济体制} = \\ \text{公有制} + \text{计划经济} + \text{按劳分配} + \text{全能政府} + \text{对外封闭}$$

在这里，有必要对上述公式中的“因子”稍加解释。式子中的“公有制”是什么？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的书面解释是，它由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构成，但在实际上则由国有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这个式子中的“公有制”，从真实的意义上说，就是“国家”（通过政府）全面而严格地掌控着这个经济中的绝大部分资源（包括这些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式子中的“计划经济”是什么？它指的是经济活动中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方式，在这种特定的方式中，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人、财、物等等方面的资源，无论是它们投放的数量、投放的地点还是投放的时间，统统都是按照政府预先制定好的计划进行。式子中的“按劳分配”是什么？从狭义上说，它是指在对这个经济所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中的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但从广义上说，它还包括对“分配”的功能、对“生产”与“分配”关系以及对分配形态等等进行规定的更为广泛的制度性内容。

式子中的“全能政府”是什么？它指的是政府的职能。“全能”的政府，不但是社会的管理者，而且还在经济领域以国家的名义掌控经济中的绝大部分资源，制订资源调配的计划，直接组织社会产品的生产，决定国民收入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起着一种集所有者、经营者和分配者于一身的的作用。式子中的“对外封闭”又是什么？它是指这个经济自主性处在一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坚持“自力更生”，沉迷自成一体（当然，这种“对外封闭”状态的出现，也跟中国大陆“一边倒”之后，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和制裁有关）。

具有上述这些体制内容和体制特征的经济，显然是根据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构建，它与根据同样的意识形态而构建的政治体制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强调“阶级斗争”，注重“政治挂帅”，轻视物质生产，罔顾百姓生活。这种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十年间，如水银泻地一般地覆盖了包括广东省在内的整个中国大陆。几十年来，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但是，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运转的经济，其实际的运行过程，其实际的运行的结果，却并没有表现出如设计这种体制的意识形态所断言的那样的“优越性”，相反，陆续披露出来的历史资料表明，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经济，不仅其实际的运行效率十分低下（如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和经济资源遭到极度的浪费），而且在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方面，也出现了利益向着国家倾斜、财富向着政府集中，与此同时，百姓却过着普遍贫穷和普遍饥饿生活的状况。这种经济的低效率和不公平，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濒临破

产的边缘。

正是这种低效率和不公平以及普遍贫穷和普遍饥饿的现实状况，迫使中国大陆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然而，面对着如山一样堆积的问题，面对着如此庞大以及如此盘根错节和根深蒂固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到底应该如何迈起步子？在缺乏自身经验的情况下，当时中国大陆的理论界，将目光投向了先前进行过某些改革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虚心地向它们取经学习。理论工作者们重温 60 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利润刺激”观点，阅读苏联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等人的代表著作（如《经济管理改革——问题与探索》等），翻译和钻研南斯拉夫有关“工人自治”的文献（如 80 年代初由“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编译的介绍卡德尔等人著作的文集），学习东欧经济学家科尔内和锡克的著作，甚至还将奥斯卡·兰格的“弟子”布鲁斯请来上课，聆听他讲述此前波兰经济改革的“理论框架”，如此等等。当然，他们也真心实意地向东亚国家、新加坡和欧美国家学习。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如饥似渴的学习之后，他们发现，尽管作为他山之石的别国经验颇有值得借鉴之处，但毕竟由于国情的不同，实在不能照搬照套。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还得从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

于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就在“碰撞”、“试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状况之下上路和行进了。

（二）

启动改革开放，关乎根本路线和根本方针的改弦更张，这只能是一种政治决定。这种政治决定，兹事体大，当然不是作为地方省份的广东所能够作出的。但是，在大政方针决

定之后，在如何改革和如何开放这个问题上，中央当局则赋予了广东为全国进行探路的任务。而在这个探路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群体的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就肩负着对改革开放进行理论摸索，对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的职责。

三十年的跋涉，征程漫漫，艰苦卓绝；三十年的探索，筚路蓝缕，呕心沥血。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在无限感慨之余，我们也可以对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中的思考，特别是对其中的一些亮点性的思考，从大体上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归纳和表述：

一是在转换资源配置方式方面，他们推崇市场导向改革，倡导市场经济目标。

改革前的中国大陆经济，从资源配置方式来说，是一种计划经济。在这种计划经济中，虽然也有着“市场”和“价格”的名头，但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买卖东西的场所”而已，而那种经由计划规定和固定不变的“价格”，也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算工具”而已！这种通过计划去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加上体制中其他内容的作用，不但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极其低下，而且还滋生出日甚一日的“短缺”问题。

广东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本来，鱼塘桑基密布的珠江三角洲，一直是人们交口称誉的“鱼米之乡”。但是，在计划经济之下，“鱼米之乡”中的“鱼”却竟然成了越来越“短缺”的奢侈品。地处珠三角的广州，市民们“食无鱼”。三十多年前，他们只能手持官方定量配给的“鱼票”，三更半夜起身赶到国营副食品商店门前

大排长龙，你拥我挤，千难万难，将“鱼票”和“钞票”两相结合，才能将“计划供应”的那半尾甚至是四分之一尾的鲜鱼最终“购买”到手。此情此景，想必是那些年过半百的老广州人都不会忘记的！

为了解决广州这些城市的“吃鱼难”问题，广东在改革开放伊始采取了一个“惊人之举”：取消“鱼票”，放开价格，放开塘鱼的供应渠道。

“鱼票”取消之后，一个为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情况出现了：市面上塘鱼的价格如火箭一样直线上升，竟然比先前的计划价格涨了好几倍。于是，一些人便投书媒体或向上级告状，对鱼价的飞涨大发牢骚，一些人甚至对主管其事的单位和部门“上纲上线”，责问这些单位和部门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然而，就在鱼价飞涨的同时，另一个颇为“神奇”的景象也出现了：广州市面上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雅玛哈鱼档”（即那些骑着摩托车往返城乡之间进行鲜鱼贩运和买卖的小商小贩。当时的珠江电影制片厂曾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一部反映广州市井生活的电影）；在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口又一口新开挖的鱼塘，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像“陈志雄”那样的养鱼大户（陈志雄，广东高要人，雇工十多人养鱼，名噪一时）。过了没多久，好像变魔法似的，大量的活蹦乱跳的鱼货出现在广州的市面。随着供给的增加，塘鱼的市场价格逐步回落，一直回落到只高出先前计划价格一倍多一点的水平，并在这个水平上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变化，想必也是年过半百的广州老市民们都还清楚记忆起来的。

广东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敏锐地看到：当商品的价格变成了真正的价格，亦即是价格由商品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所决

定的时候，价格的上涨，是商品供不应求的必然结果。而价格的上涨则一定会起到信号的作用，对资源的流向进行导引，刺激供给的增加，从而使这种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达到平衡，并使得这种商品的价格自动地趋于平稳。这种变化，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正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优越性所在。于是，他们对于有关部门放开鲜鱼价格和鲜鱼经营渠道的做法，对于农村出现的“陈志雄”式的专业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计划经济最早出现的这个小小的“缺口”，予以了高度的认同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从而为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广东，上了一堂形象而生动的“市场”课。

（一位广东经济学者在《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体制下人为的价格扭曲，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有“鱼米之乡”之称的珠江三角洲，连每月居民定量供应 0.1 公斤的鱼也买不到。因为国家定价每公斤塘鱼只有 0.8 元，生产成本无法补偿，没有人愿意养鱼。塘鱼价格放开之后，塘鱼产量以每年 11.7% 的递增速度增长。这位学者称其为“珠江巨变”。）

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期，中国大陆的改革逐步从农村转到了城市。城市的改革究竟如何进行？有人主张从企业本身改起，有人则主张从改变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做起，一时之间，众说纷纭。就在这个时候，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通过他们的思辨，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突破中间，带动两头”的改革战略。“中间”何谓？就是市场的建设！“两头”何谓？就是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他们主张，将“市场”放在首要的位置，花最大的力气去培育具有统一、平等、自由和外向性特点的发达的市场体系，然后根据市场运转的要求

去确定企业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内容和改革的重点，并根据市场运转的要求去调整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方向、干预内容和干预重点。他们认为，只有抓住“市场”这个关键，首先进行突破，才能将改革全面带动起来，并有效地将其推向前进。

到了1988年，广东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对市场配置资源个案的颂扬，甚至也已经不满足于提出“突破中间，带动两头”的改革战略，而是开始思考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他们连续召开了几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系列研讨会，并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一定要朝着现代市场经济的目标迈进。之后，他们结合广东的改革实践和自身的理论思考，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十分鲜明地提了出来，不但形成了向高层建言的正式文本，而且还公开出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一书，为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进行“鼓与呼”。

市场经济，当然不是广东的发明。但受到卓炯先生“商品万岁论”思想（改革开放后，这一思想演进为对“商品经济”的明确主张）熏陶的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先于全国同行对市场经济予以认同，并正式建言将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这不能不说他们对市场经济有着一种特别亲和的情愫，也有着一种敢于将这种情愫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公开表达出来的胆识。

以上，便是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推崇“市场导向”改革，倡导市场经济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可圈可点的努力。

二是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他们坚决支持顺德产权改革，力主构建多元分立的所有制架构。

作为旧体制中内容和特征之一的公有制，不论是全民所

有制（以国有制为代表）还是集体所有制，在真实所有者缺位、无人对资产承担真正的责任以及其资产赢利极有可能沦为小团体、个别自然人所得等等方面的弊端，则是共同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的区别，只是由所有制所界定的资源调集范围有点大小不同而已（1958年在中国大陆农村刮起的那场“共产风”，甚至连这个小小的不同之处也都被抹平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在原来的人民公社“社队企业”的基础之上，涌现了数量不菲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广东的顺德市，情形也是如此。这些“乡镇企业”，曾一度被当作异军突起的力量而广为宣传。

但是，这些挂着“集体所有制”名堂的“乡镇企业”，大多数是由政府部门（以“经济开发公司”之类的名义）出资或由政府担保向银行贷款而创建并交由私人去进行经营的企业。当然，在这些“乡镇企业”中，也有一些虽由私人投资但却“挂靠”在政府部门并由政府承担着巨大连带责任风险的所谓“红帽子”企业。

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了确保“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并用以彰显“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在进行经济统计的时候，上述的这些企业都曾被当作“公有制”的成分而列入“主体部分”项下，向上进行汇报或是对外进行宣传。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这些所谓的“公有制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赚钱归于个人，亏本推给政府”的问题。这种问题，在“乡镇企业”特别发达的顺德表现得特别严重。

顺德市的政府，较早地发现和意识到了这种“收益有限、风险无限”的问题及其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顺德出台了一

系列对这些企业实行改革的政策和措施：摘除它们的“红帽子”，恢复它们的原本面貌；采取“靓女先嫁”等办法，从政府出资或政府担保的企业中抽身而退。这就是发生在 1993 年的顺德产权改革（顺德的改革，是个综合的改革，除了上述的产权改革之外，还包含了与之相配套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在此不赘）。

一石激起千重浪。顺德的产权改革，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当时的《经济日报》几乎用了半个版面的篇幅登载文章，对所谓“贱买国有资产”的“顺德××事件”进行严厉的指责。而某些人更是上纲上线，将顺德的产权改革提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其“帽子”之大，其“帽子”之多，简直到了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地步。

就在产权改革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时候，广东的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来到了顺德。他们对顺德的产权改革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调查，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观察、思考和判断问题的标准，得出了顺德的这种改革不仅方向正确而且预后良好的明确结论。为此，他们召开了“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对顺德的改革给予了坚定的理论支持。而且，他们还积极建议广东省推广顺德的改革经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对顺德产权改革的支持，是在改革实践最为需要的时候，也是在最有可能遭到“政治风险”的时候所给予的支持。因此，这种理论支持就显得特别的有胆识和特别的难能可贵！

（不过，令人特别痛心的是，由于一些条件所限，顺德产权改革的经验并没有在广东全省推开，致使广东错失了一个改革的良机。这也是广东一些国企至今沉痾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他们对分配的激励功能给予正名，对商品的价值理论进行创新。

旧体制中的“分配”，是一种被“公有制”和“阶级关系”僵硬规定的分配。它除了用以表现“制度优越性”之外，不能有其他什么功能。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如果有人试图将激励生产和激励发展的功能赋予分配，则必定被斥责为是“修正主义”，遭到严厉的批判；旧体制的分配，又是一种实物形态的通过计划而进行的产品分配；这种分配，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以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原则，而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中则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当然，如前所述，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这种分配则是一种利益向国家倾斜、财富向政府集中而在老百姓中间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这种分配所造成的实际结果，便是对少数特权利益的确保和百姓过着普遍贫穷、普遍饥饿的生活。当然，与这种分配制度相伴生的，是普遍的怠工、窝工和出勤不出力，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摧残。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对于旧体制中的这种“分配”，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对其进行了冲击和突破。

1978年，广东的一位经济学者对广州黄埔港码头装卸工人工资形式进行了调查研究，撰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发表在当年的《红旗》杂志上。这位学者从实证的角度为“计件工资”正名，并公开呼吁恢复“计件工资”，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所发出的呼吁，是针对被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搞乱了的“生产”与“分配”之间关系的一种拨乱反正，同时也对“分配”具有激励生产和激励发展的功能，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明。

在中国大陆的分配开始发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

变化的时候（在这里，必须特别提到广东在这方面的实践：改革开放后，“三资”企业蓬勃发展，外资的进入和“三资”企业的运营，使得“利润”之类的分配形式合法化和普遍化。另外，还发生了开全国之先河的两件事：一是1987年深圳经济特区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二是1992年珠海经济特区重奖科技人员），广东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先于全国同行意识到了传统价值理论跟分配改革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并且很早就作出了预言：如果不对传统价值理论进行扬弃和创新，如果不用创新的价值理论去指导分配原则和分配政策的制定，便极有可能在分配领域中滋生出严重的经济问题并由此而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

广东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创新价值理论方面率先作出了尝试。1992年，一位广东的经济学者提出了能对市场经济中的分配进行诠释、预测和为分配原则的制定提供依据的“资源贡献价值论”，并随之提出了“按要素贡献分配”的重大政策主张（该主张最后为中共十六大所接纳）；此外，还以“资源贡献价值论”为基础，提出了创建一个由市场分配、政府调节和道德调节三个层次构成的、并以激励效率和追求公平为目标的现代分配制度的构想。

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分配体制改革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在创新商品价值理论和构建现代分配制度方面所作的努力，显然是一种在基础理论和重大政策方面的贡献。

四是在对外开放方面，他们支持特区的创办和运作，维护特区高度对外开放的制度设计和市场调节为主的体制特征。

在对外封闭的“铁板一块”中，在计划经济无处不在的现实状况下，“挖”出一块地理区域，让这个区域实行高度对外开放政策，率先跟外部世界发生紧密的经济联系，并让这

个区域的经济活动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使其成为一块“试验田”，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特区”。

在中国大陆最早创办的经济特区中，广东省便四有其三。

实事求是而言，创办经济特区的提议，并非出自广东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创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也不是由广东地方当局所作出。但是，经济特区的那种高度对外开放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特征，跟广东经济理论工作者关于改革开放的基本理念，在基本价值的判断上，是高度吻合的。

于是，在特区创办的初期，他们深入特区调查研究，撰写了数十篇的文章，为特区大造舆论，更对于在梁湘和袁庚身上得到淋漓尽致表现的特区人敢闯敢干的气度和“开荒牛”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1982年，他们举办了全国首次“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为特区的实践从理论上提供支持；而当特区在其后运转过程中遭遇到风风雨雨的时候，特别是当特区被某些人扣上“新租界”、“新殖民地”之类大帽子的时候，广东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不惧压力，一如既往地站在了特区的一边，坚决维护特区高度对外开放的制度设计和特区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体制特征。

当然，当特区出现“内卷化”和“衙门化”等问题，从而偏离了所设计的制度轨道和削弱了自身体制特征的时候，广东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也曾对此给予过严厉的批评，从而使他们成为经济特区的一群“诤友”。

五是在对外开放方面，他们提出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倡导经济国际化，为广东谋划出“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改革促发展”的路径。